

# 对话勒克莱齐奥

董 强 整理

2008年1月，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前来北京领取他刚刚荣获的“二十一世纪外国小说奖”。他从韩国的首尔风尘仆仆地赶来，因为他在那里的韩国梨花女子学院讲授法国文学。由于以为北京与首尔的温度差不多，而首尔已经比较温暖，他穿了凉鞋前来，被北京某家媒体视为佳话。

但是，当时的勒克莱齐奥，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说，还非常陌生。可以说，假如不是因为北京电视台某位记者与人民出版社某位编辑的个人友谊关系，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可能不会留下任何公众方面的痕迹。

然而，他作为伟大的法国作家，在中国的一些法国文学专家和学生的眼中，具有崇高地位。在他领奖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极小的会议室内，勒克莱齐奥与社科院的吴岳添、余中先、陈树才，首都师范大学的李玉民，以及姜丹丹、冀可萍两位女士，还有我，一起进行了非常小范围的座谈。由于我与勒克莱齐奥先生的私人交情，大家推举我主持了此次座谈。我注意到，人民出版社方面没有任何人在场。由于事先觉得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邀请了出版人胥弋在现场进行了摄像。事实证明，这一摄像记录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没有被摄像的部分，在座各位可以说几乎都遗忘了。以下的记录是根据摄像内容完全忠实地笔录并翻译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小范围的氛围，让他觉得放松，这位在法国面对主流媒体也从不多言，以腼腆、寡言著称的大作家，对各方面问题都进行了回答，而且非常轻松自如，幽默、自然。

座谈围绕他的作品、他的为人而展开，但涉及面非常广泛。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勒克莱齐奥是一位对中国情况非常关注的作家，他的谦逊、他的世界视野使得他时刻对“他者文化”保持兴趣，并对自己所在的欧洲的许多文化问题提出批评看法。一些小小的细节，如对中国的户口制度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了他做人的宽厚和幽默感。

我们看到，与这位作家的座谈，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专业，涉及到真正普遍的文化问题。这次座谈，也可被视为一次真正的“跨文化对话”。

如今的勒克莱齐奥，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相信，他再也不会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中与屈指可数的几个专家座谈，镁光灯与

摄像机将到处追随他，我也将再无需因为对这样一位大作家如此简单的接待而为一些单位的领导感到脸红。然而，相比之下，这一无意之间留下的记忆，就显得尤其珍贵，因为从任何一方来说，都没有丝毫因光环而带来的刻意，乃至做作。作为朋友，作为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在为勒克莱齐奥、为法国文学高兴的同时，我也从心底里为能够为这位作家在几乎不知名的情况下留下了痕迹而感到些许自豪。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们提供了座谈的机会；感谢胥弋先生，没有他的记录，此份珍贵的资料将不可能存在；感谢我的学生伍倩、方尔平、张怡，他们的笔录非常准确，翻译也很达意，我只是在少数地方帮助了他们。

董强 于北京南池子

**董强：**诸位都是法国文学的专家，既然大家推举我来主持，我又恰好坐在了勒克莱齐奥先生的身边，我就开始了。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刚到的胥弋先生，他将在这次座谈进行摄像记录。他是个自由出版人，正在出版圣-琼·佩斯的作品。

**勒克莱齐奥（以下简称勒）：**哦，他的作品很难。

**董强：**是的。中国有一些国有的大出版社，同时也有一些小的出版机构，他们就像依附于出版社的小作坊一样……不过他可以自己选择主题，选择译者，并且有权签合同，然后再通过一家大出版社进行出版，以便获得更多的发行量。

**勒：**如果和法国相比的话，中国的出版业情况很特殊。在法国，很多出版社都是私有的——仅有的几家国有出版社出版的都是官方报刊的出版社，但也时不时地出些不错的书——所以导致（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有时，商业需求就这样损害了作品的文学性。我在伽里玛出版社审稿组工作过，有时候，仅仅因为商业顾问的一句“这玩意儿连三四千册都卖不到”，结果就把一些非常好的书拒绝掉了，尤其是诗集。这种体系是有缺陷的。

我很想在法国建立一家出版社。当我在伽里玛做编辑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我要把所有被拒绝的书都出版了，它们实在挺棒的。

**姜丹丹：**我想向您提一个小问题。十年前，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得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那时候我才知道您是和他被归在同一类的：大家还为你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新寓言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您的第一部小说。事实上，我不清楚您是不是真的认同这个称呼？后来在日内瓦学习的时候，我去听了现代小说的研讨课，老师曾经就您和乌艾尔贝克等人的作品专门办过讲座，那时候我才知道您原来和莫迪亚诺不是同一回事儿。我想听听您本人的看法……

**勒：**莫迪亚诺，我和他来往挺频繁。我有一段住在巴黎，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散步；他住在巴黎的十五区，他带我去那儿游玩，我们一起散步：或去咖啡厅，或去商场。不过，我觉得我们写得不是一样的主题，其实相当不同：他呢，他总是谈到对于二战的记忆，而这并非是我灵感的来源。不过，我也写了一部挺

莫迪亚诺式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巴黎。因为我现在正在结尾的小说就发生在巴黎十四区。故事发生在战前，在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种种运动开始前，这是我母亲生活的年代，我还记得她曾经带着悲痛谈及这一段时期，她说，因为觉得战争是不可能不发生的，简直无可避免，大家都感到了即将来临的战争，这种情绪应该是很令人焦虑的，而且又和那些可耻的运动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对于犹太人开展的种族主义运动：简直把他们描写成了动物，看看报纸上的文章，就会为这种语言暴力所惊异。所以，我想这一点来看，我和莫迪亚诺还是有重合的。但是只不过存在于灵感的开端……除此外，我们的小说大不相同。

**董强：**十四区是犹太画家们的聚集地，还有巴黎学派，画家苏丁，等等，有被称为“蜂房”的著名艺术家居住地。

**勒：**对，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里是俄国的革命者的聚集地，他们就住在那一带。当时，娜塔莉·萨罗特我母亲年纪相仿，她跟我说，他的父亲曾和列宁一起下象棋。他们在咖啡馆里碰面，俩人都是俄国人，因为我的祖父也是象棋爱好者，所以大家还问他有没有和列宁下过棋……

**董强：**是著名的“穹顶”咖啡厅吧？托洛茨基老去那儿，他和列宁就常常在那家咖啡厅见面。

**勒：**对。有一天，两人正下着棋，列宁对萨罗特的父亲说：“对不起，明天我来不了了，我在德国还有事儿要办”。他在德国要办的事，其实就是途径德国到达俄国，开展革命工作。

**姜丹丹：**莫迪亚诺总是被二战的记忆所困扰，而且常常将作品的场景设置在巴黎，而您，您则致力于寻找未知，您的作品总带着游荡的印记。

**勒：**巴黎的确是座充满了记忆的都市，不过也充满了遗忘。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曾发生过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惨剧发生过的地方常常一夜间就变成令人难受的日常场所。

**姜丹丹：**我想向克莱齐奥和董强先生你们两位提个问题：你们是朋友，已经结识很久了，克莱齐奥先生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亨利·米修的孤独》，

而董强先生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米修……

**董强：**我都不晓得您知不知道这事。

**勒：**董强先生谦虚有加，我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笑）

**姜丹丹：**我想知道米修是不是也是你们二位之间交流的主题呢？

**勒：**我不记得我们谈过他没有……

**董强：**您跟我谈起过他，尤其是在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那封信我还精心保留着。您提到您以前写过洛特雷阿蒙，不过在飞机上弄丢了。

**勒：**确实。我弄丢的是我博士学位的论文。那时候，又没有计算机可以存储，所以也就永远丢了。

**董强：**洛特雷阿蒙和米修，也就一步之遥。

**勒：**对，他们非常接近。而且在米修身上有种很有意思的东方味道。他对东方很有激情：对日本、对中国，尤其对于印度，对日本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他是最东方的法国诗人，甚至表现在他的体貌和行动中。他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不会轻易谈起自己，总和学派啊、运动啊保持距离。

**姜丹丹：**诗歌呢，这种体裁是否对于您的创作有影响？

**勒：**是的，比如米修的诗，因为这是需要锤炼的……我觉得诗歌是门讲究控制的艺术。人们都说现在乱写一通就成诗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写诗非常难，因为必须真正地掂量所说的东西。这是种控制，是种严格的精简，小说就自由多了，可以有所放任。

**董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做得是雅各泰，也是唯一完成此博士论题的中国女子……那边的树才则是诗歌的专家。

**树才：**对，让我们谈谈诗歌吧。

**勒：**比如弗朗索瓦·蓬热，就是一位很精简的诗人。

**树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看过您为马克斯·雅各布的书写的序言。我觉得您对诗歌还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不知道您还写过洛特雷阿蒙的论文。

**勒：**雅各布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人，很复杂，很有趣。下学期，我将在首尔开诗歌课，将会谈到诗歌的精简。词语、手法的精简。必须得留神，不能天马行空即使天马行空，也得有所控制，米修就是这样。

**董强：**谈到这儿，我记得有时候法国批评界用“有节制的抒情”来谈起您，您认可这种称呼吗？

**勒：**这真是过誉了。

**董强：**那就说您认可了？

**勒：**是的，完全认可。我想，嗯，我们当然可以乱写一通，尤其在今天，什么都能过得去，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这关。

**董强：**精简这个词在法文中意思很多。有节省的意思，也有结构的意思。当您谈到文学上的精简，是不是也有“结构”“构造”的意思呢？

**勒：**“构造”，是的。我们在结构上不能乱来，即便我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要押韵，要数数有没有少了音节。今天——米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已经是自由体诗歌了，但是也具有非常强烈、非常显著的结构。

**树才：**就我所知，在那些还对诗歌感兴趣的中国人眼中……

**勒：**为什么说“还对它感兴趣啊”？（笑）

**树才：**……很多人都欣赏米修，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董强说他应该多腾出些时间来做诗歌翻译。

**勒：**对，米修写过关于中国象形字的论述。

**树才：**除了他，我还翻译过勒内·夏尔与弗朗索瓦·蓬热。我们今年还有幸出版了蓬热的诗集，《物语》。

**勒：**还有他的《草地的制造》，也很有趣。

**树才：**您对伊夫·博纳富瓦后的诗歌有何看法？

**勒：**我读的现代诗不多，我最近几年读过的诗集是乌艾尔贝克写的。我觉得他很有力量，我觉得这比他那些取得成功的小小说写得好，他那些小说都为了销量因素写得比较商业化。他选择一些比较淫秽、吸引眼球的主题，激发人们的购买欲。他的诗歌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令人联想到一些美国诗人。我也比较喜欢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诗人，他们带着一种觉醒，来描写现实的苦涩，讲述他们所属的时代，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那时候法国社会所经历的种种悲剧。还有米歇尔·德吉的《诗歌》杂志，其中的诗比较渊博、晦涩，我就有些看不懂了...  
...

**董强：**雅克·莱达……他的风格也很有力。

**勒：**对，莱达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新法兰西杂志》的主编。他在巴黎生活，有点儿像在北京，穿个风衣，骑自行车、骑摩托……

**吴岳添：**您对每年的畅销书有什么看法？

**勒：**我不读，我不知道。比方说得了龚古尔奖的《复仇女神》，我试着去读，但是太无聊了，有些畅销书作者很快就让我感到厌倦。我根本就读不进去。作者叫什么来着？

**余中先：**乔纳坦·利特尔。

**勒：**对。我不懂这书在讲什么主题，这书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这书算是清帐呢，还是对被推至极端的痛苦的分析，反正就是弄不懂。可能是因为他的语气

有点冷峻。

您读过这本书吗，先生？

余中先：是的，我读了，还翻译了……

勒：勇气可嘉！

余中先：这本书让我很棘手。它并不是完全用法语写的，还有很多外语，德语和俄语，还有很多与历史相悖的地方……它大力批评纳粹，国家党人：（探讨）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必须的，还是被他人所强，或者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才犯罪？

勒：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国人对这种记忆很感兴趣，而这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因为这种记忆仍然很重要，而且又被隐藏起来了，所以老得谈到它。

冀可萍：我很喜欢《春季与其他季节》的文风，觉得那本文集非常出色，但是批评界却熟视无睹。我的硕士论文论述的正是这部作品。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在作品出版时的一次访谈中，您说过这是您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您可否阐明这一说法的确切含义？

勒：我已不记得我曾说过这句话了。

冀可萍：您说过，我确定。

您对这部作品是否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勒：或许是作品的创作手法，因为我写那些东西的目的是制造一种绵延，但并非季节的绵延，而是……怎么说呢，在地理方面，使我所熟悉的主题的前后延续。在谈论那些主题的时候，使它们仿佛与季节互有关联。比如说，摩洛哥专门有个季节，叫雨季，这在我们欧洲是没有的。《春季与其他季节》与我的摩洛哥之旅联系在一起，与一种与“爱”只有一步之遥的“新颖”感联系在一起。在作品中，这一思想有着一一种刻意为之的、结构严谨的创作手法。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说了那句话。确实，我谈论过诗歌的结构，说过小说是相当自由的。



每当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对即将落笔的内容不会有一个确定的想法，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使这一想法逐渐发展起来。在《春季与其他季节》中，或许其思想具有文学性，也即它的形式具有文学性。

**董强：**我介绍一下，冀可萍女士正在写关于您的博士论文，题目大致是关于“女性特质”，也即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这里的“女性”（femme）一词其首字母应该是大写的。

**勒：**我特别喜欢描写女性人物……

**冀可萍：**不过，您很少谈论这一主题……  
我找到的资料相当的少。

**勒：**是的，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吧，你是第一个……你要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回答相关问题。

的确，我喜欢构思一些女性人物。在墨西哥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一个日本的女性朋友，她和一个墨西哥人结了婚。这个墨西哥人是个历史学家，所以她告诉我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历史中只有男人们的事情，至于战争期间、战争之前或重大历史潮流中女性的生活状态，我则一无所知。女性，也即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已经被彻底遗忘。”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正如她所言，历史是相当男性化的，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在历史中，女性或是不出现或是很少出现。

我一直希望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讲述历史，或是历史的某个片段，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相当不同的，而我们所能了解的，也将大有不同。我现在正在创作的、即将完成的小说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在这部小说里，我通过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讲述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蔓延，比如她是怎样感觉到这一现象的，她的亲戚朋友在聊天时是怎样谈论这一现象的。我想，作为一个女性，她在那个历史时期所体会到的惊慌心理应该会更为剧烈。如果不去投票，人们就无法左右历史事件的进程，甚至会被排斥在战争之外。二战之前，女性不能参军，或者很少参军，甚至而今依然如是。

我记得，法国女性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才有了投票权——1946年以前，她们是没有投票权的。我还记得我的祖母损失了她的所有财产，因为祖父用掉了这些财产。祖母什么都没了，一切尽在祖父的手中，他花掉了那些钱财，毁了自己

同时也毁了他的妻子。祖母无权在银行设立账户，她没有投票权，也无权接受教育。

我想，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确实只是男人眼中的历史。因此，我很喜欢创作女性人物，使自己置身于女性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整个日常生活，男性与女性的观点截然不同，很明显地截然不同。

**董强：**我很好奇，您说，在您看来，法西斯从产生到蔓延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您说“二战之前”，但它应当一直上溯到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

**勒：**是的，确实如此，它是在你所说的那个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我觉得，不幸的是，它现在依然存在。我们尚未走到终点，因为战争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转移了种族主义的目的地：战争并未终结种族主义。

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大部分纠结于中国的国力。在经济上，中国是个强国。不过，我认为，这一说法其实对中国的实力不尽赞同，比如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的能力。人们忘了中国有很多发明，他们会说：“不错，但在中国人们都在抄袭，人们都在制造复制品。”我认为法国也有这一种族主义倾向，只是不正确的

我有几个韩国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本来住在大学城，后来迁居到巴黎郊区的布尔拉翰。这对年轻夫妇在布尔拉翰下了火车，踏上了月台。在那儿，有个人说：“啊，我们周围全是黄种人！”可是，事实上只有两个黄种人、一对大学生夫妇而已。这种反应，我觉得……我们对之报以一笑，但这确实是一件严肃和严重的事情。

**吴岳添：**您比我年长四岁，但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您是否有退休计划，或是打算笔耕不辍？

**勒：**没有，没有，我不会退休。我非常愿意写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此外，这能使我保持健康。不知道是在哪部影片里，主人公说，致人死亡的第一大原因是退休。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正是退休。

在法国，作家没有退休保障制度，——应该说现在已经有社会保障制度了——但是作家享受不到什么退休津贴。音乐家有退休津贴，但作家没有。确实，身为作家，他可以一直写到生命的大限。也许音乐家就不同了，可能是有技术方面的约束吧。

**吴岳添：**您这样的作家，得益于您的版税，您在法国是否相当富有？

**勒：**这是个隐私问题，但……

**董强：**相当“隐私”。

**勒：**像农夫一样，我有好的年成，也有不好的年成。好的年成可以对不好的年成进行补贴。我时不时地在韩国授课，作为帮补，但还是不太容易。乌艾尔贝克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他迁居到了爱尔兰，因为那里不用缴税。这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现在……

**李志明：**靠写作生活是件难事。

**勒：**非常困难。

**董强：**您是少数成功者中的一位。

**勒：**是的。我想，这样的人宛如凤毛麟角，大概十来个，十几个。在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

**树才：**像您这样声名赫赫的作家，能够生活得相当滋润。

**勒：**在中国，真的？

**李志明：**但靠的并不是他的书，而是他的工作岗位与地位。

**树才：**不是岗位或地位，而是他的写作。

**李志明：**但即使不写作了，其生活依旧不错。

**董强：**其实，这和电影改编有着很大关联。

**勒：**对。法国有个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是个中国人，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是个当代小说家，写侦探小说的，写侦探故事，以及中国的黑帮社会。

**董强：**当您在创作一部主题比较严肃的小说之时，比如您的下一部小说探讨的就是种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看待作家的角色的？您并不以政治人士自居，甚至也不把自己看成历史学家。那么，您的角色，或者说您的位置在哪里？为什么您选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探讨这样一个严肃而重大的主题？您的话语代表着什么？

**勒：**我写的都是那些我所熟悉的历史段落、历史时期或某种历史境况。如果我与这一时代之间没有亲身联系的话，我便无法写作。我新书中的那个时代是我母亲所经历的时代，她曾和我谈起过，因此我对之非常了解。母亲是个见证者，是个目击证人，在我看来，她告诉我的那些要比……某个与这一历史时期没有直接联系的历史学者更有说服力。因此，我能够以这一历史时期为主题，哪怕我所写的甚至可能会与历史作品相互抵触。

其实，我真正想写的，并非那个历史时代，甚至也不是种族主义现象，而是对于一个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年轻女性来说，这些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那个历史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之间有相似之处，二者差别不大。从根本上来说，那个时代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今天的进步之处，那个时代也已出现。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已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危机以及生态，换言之，那时的人们已试着去发现这些问题，而今天的人们则确认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此外，在那个时代里，在回首过去的人与展望未来的人之间，已经有了某种共享。

**姜丹丹：**我们能否说，在您的大部分小说中，时间总是“在时间之外的”也就是说，在您所书写的那个时代里，时间其实总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外在于时间流程的”性质？

**勒：**我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在每一代人那儿都不会停滞。从上一代过渡到下一代，新一代人拥有着某些属于上一代人的事物，使过去向前发展，使其演进，这是一个延续过程。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不会出现断裂，除非发生革命，比如在中国就发生过。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我们会发现，不久之后革命就会被遗忘，人们又和之前的时代建立起联系。人们并不否认过去，而是以某种方式与之融合在一起。不过，要想与过去相融合，就必须认识过去，或许这才是最为困难的，对中国历史和法国历史而言，都是这样。

中国遇到的困境与西方不同，但中国同样也经历了战争，先是遭到了日本

的侵略，后来又发生了文革。这些历史时期困难重重，但是当它们完结之后，人们就能够与之前的时代建立联系，从中汲取教训，吸收经验。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中国人懂得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建立联系，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在中国，每个家族各代人各个成员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这在欧洲却并不存在。

还有一个国家也没有这种现象，那就是美国。我在美国教课时，班上有一个女学生，她和父母走散了。原因很简单：17岁那年，她中途辍学去附近某个城市工作。当她再次回到家乡之时，她的父母已经迁居别地，而她却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那年她18岁，与父母走散了。她的父母从此销声匿迹，不知道女儿身在何方，而女儿也不知道她的父母住在哪里。在美国社会，这种现象非常典型。我想，在中国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中国人不会丢失他们的父母，尽管中国国土广袤，但是在法国，这种事却并非不可能发生。

**余中先：**但中国有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一直存在着的户口，它维系了……

**勒：**对，我听说过中国的户口。据说所有的结婚、离婚经历都会被记录在户口本上……

**树才：**此外，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家谱……

**勒：**妻子一边如此，丈夫一边也如此？当一个女孩即将结婚之时，她的恋人可以翻阅她的户口簿，以此确认未来的妻子有过几次离婚经历。（笑）

在法国，岳父岳母一般会委托私家侦探，跟踪调查未来的女婿，以便确认他是个不错的人，但是在美国，人们一般不这样做。

**董强：**确实，您对家庭关系非常重视，在您的小说中，例如《奥尼恰》、《隔离》等，您多次谈到您的父亲，同时也回忆了您的母亲以及您母亲对您说过的话我给您提出的问题正好与此相关：您希望您的孩子从您这儿、从您对她们所讲述的故事中汲取什么？当然，这里涉及到的是下一代人。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成为像您这样的作家，不过您作为父亲，是否有一些最为基本的东西想要传递给您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勒：**这和家庭记录有些相似，我重视的是这样的记录所体现的某些方面，

也就是说，我希望她们能够保留住家庭记忆，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关系。

此外，我的一家祖籍毛里求斯，并非法国。在毛里求斯，我们已经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指的不仅是父亲、母亲、孩子，还包括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叔母伯母姨母、侄子侄女等等，我们必须和所有这些家庭成员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我要求我的孩子定期去毛里求斯，去见见她们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要求她们清楚地了解并维系一种根系，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根系，也不是基因遗传意义上的根系——我的妻子是摩洛哥人，但我对此并无见——而是家族根系，维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

对我而言，这些事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在写作中运用了很多这样的素材。只有当有人跟我讲述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能与我所写作的内容建立起某种联系。假如没有人跟我谈论过某一事件，假如我与这一事件没有具体的联系我便无法谈论它。同我讲述这一事件的不一定非得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其他人比如，您也可以和我谈谈您的家乡，对我来说那是一种特殊的视角。正是这一点使我对文学有了兴趣，它很具体，而文学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层面。

**姜丹丹：**我觉得，在您作品所展示的主题和空间中，总是有一种接近于哲学的东西：这是一种感觉，但我并没有在您的作品中找到关于哲学方面的论述。我很想知道您是否觉得您和某些哲学家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勒：**我对哲学理论——但不是对哲学家——一直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对那些重要的文化主题曾感到怀疑，但相对地，我却很喜欢这些主题的表现方式。例如，我觉得佛教就很有意思：在日本的诗歌中，佛教催生了一些文章和短篇故事，人们将这些故事称之为可以握在手中的故事（小小说）。我忘了这在日语里该怎么说，但它们就是为了可以握在手心而写的。这些故事都是受到佛教的启发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受到一种很强的自制的的影响。但是，我不知道，也许在道教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也许在中国文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有意思的教益，就是我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中一直保有的那种坚持。

**姜丹丹：**您还是更受智慧和东方哲学的吸引吧……

**勒：**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智慧”。

**姜丹丹：**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您提到了小说《乌拉尼亚》。您说，它是您所创造出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城市的形象，但它更是一个为女性而建的城市，一个与其他女性不同的女性……

**勒：**事实上，这个名字是我在战时想到的，我父亲那时不在我身边，我周围生活的都是女性。我就想，这应该就是理想的社会（笑）。之后，我父亲又回来了，又开始由他来主持一切。这是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相联系的。

但是同时这也因为是，当我生活在墨西哥的时候，那里正是一个有许多乌托邦式的社会产生的地方，特别是堂瓦斯科·德·奎若加主教所提倡的乌托邦社会。这位主教是墨西哥中部的第一个天主教主教，他想要创建一个理想的城邦这个理想的城邦是四四方方的，就是说街道很窄，每个街区都被分配给一个手工业的工种使用：印第安人就像这样搬了家的，木匠在这里，乐器生产者在那里，陶罐制造者，织布工人，纺织女工……所有的都按街区来分，每个街区都有一个中心广场，可供大家集会和讨论问题。

这个城市一直存在着，看着它维持了这么久，看着直到今天印第安人还是原来安排的街区分区，看着它最后发展得不错，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把这种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就是说关系……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而所有权是循环的，所有人都有土地，但是它们是轮流的，就是好的地不是一直留在同样的人手中，它们是随着年份轮流的。但是这局限于一个村落的范围，我们无法想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运转。

殖民历史一直浸透着我们，这种理想社会也与殖民历史有关系。我经历了殖民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是最后的阶段了，十分艰难；我最好的朋友们差不多是一到阿尔及利亚就被杀了，他们都死于战争中。

安德烈·马金也经历了这一切。他好像在阿富汗打过仗，膝盖受了伤；之后他就有些瘸，当他在机场过安检门的时候，他膝盖中的金属片就会发出声音。每次工作人员拦住他，他说：“我是一个伤兵。”

**冀可萍：**您在《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一个人物就是以您的朋友为原型的。

**勒：**是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人。我对此感到很难过……

**董强：**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些标题中，您用了像“革命”、“战

争”等等这样的词，在评论界大家也说到过您“政治介入”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您的文学态度似乎还是建立在一种对“奇妙世界”的寻找上，甚至可以说，您身上有着一种差不多是“中性”的东西，其实您并没有特别地去介入政治。至少，我没有发现。您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为世界的奇妙而惊叹，并从不同的文化的多样性层面出发。您怎么看待这一点呢？

**勒：**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这是真的。我时不时地去参加一下投票选举，但是事实上我的确没有觉得自己是介入到政治中去的，它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也很难在思考时，完全排除当代世界中一些重大主题的影响：因为它们一直在那里，它们是存在的。当我谈到种族主义的时候，这的确是当今法国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大家都不谈它，隐瞒它，我觉得这很遗憾。但我们在了解这一切的同时，也可以为世界的奇妙而赞叹。世界并不完全是这些政治运动为我们提供的那个样子。

**董强：**在您看来，这不是矛盾的，您甚至是拥有两种立场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勒：**这不是两种立场，它们是同一种。只是我对于一些事件一直都怀有一种好感，我总是和那些在受苦和在观察着的人们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作家，而作家在法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我不知道在中国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一个法国作家没有任何的权力：世界并不会因为作家写了一本书就发生改变。伏尔泰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此外，我们知道，其实伏尔泰也不总是那么干净的，因为他在印度公司中也有投资，他也有参与奴隶贸易。

**董强：**甚至更近一点，安德烈·布勒东的那个时代也已经结束了，那个布勒东梦想的作家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的时代。

**勒：**是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目的，但也许作家可以成为“世界的回声”，这样就好一点。不管怎样，世界总是在改变的。

但是有趣的是，是一代代人的传承，我能感觉到它……我开始感觉到它了。现在我已经上了年纪，我很有兴趣地看着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能想象的方式发展着。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革命；例如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法



国就有许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尤其戈达尔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但慢慢地，我们发现这些事件，这些看似很重要的历史运动其实并不如隐性的变化发展那么重要，尽管后者只是因继续生存的必要性而出现的，而这个必要性，我想，它就是：人类都有要一起生活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度。在我看来，它并没有经历过历史时期的重大转折，除了那段可怕的半殖民时代之外，不过最后，它也是胜利并顺利地度过了这个时代。

亨利·米肖讲过的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就是关于他见证了“义和团”运动。我知道他曾做过海员，到过上海。在那里，他在街上看到了许多事情。人们要求赶走外国人，让他们离开上海，尤其是要离开租界区，这一幕给亨利·米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树才：**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它的转折期经历了许多磨难。在近一百年中，中国至少经历了两次转折。在一百年前，我们甚至中断过汉语的传承。您的小说现在被翻译成了现代汉语，但是在一百年前，则它们就是文言文了。在那个时期，中国文人认为文言文是中国贫弱的原因之一。

**勒：**汉字系统能将广东话和普通话统一么？

**树才：**文字书写是一样的。

**勒：**如果文字是一样的，那么书籍可以用两种语言来读？

**树才：**在如此古老的语言内部，结构还是变化的。现在，这种语言是一种不太“简约”的语言，而是一种比较长的语言。

**勒：**也许一种新的语言正在生成中。如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那我们不能阻挡它。如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如果它是因时因势而产生的，那么我们不能阻挡它。我们可以减缓它的速度，我们可以控制它，但我们不能阻挡它。

**树才：**在那个时候，为了振兴国家，中国很想向西方学习。

**勒：**我对历史了解不多，所以无法对您所说的发表看法，但我想这应该是一些我所不知道但却有趣的事情。

**吴岳添：**您知道罗杰·卡洛蒂先生是否还在世么？

**勒：**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无法回答您。

**吴岳添：**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已经 94 岁了。

**勒：**我知道的是，列维斯特劳斯还在世——现在他应该已经快 100 岁——而且他的身体很好，因为不久前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他的笔迹还很有力。在法国有一些人也是很高寿的。因为我们总是说中国人的寿命很长，最长寿的世界记录的保持者就在中国。

**董强：**我想这里也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拥有 13 亿的人口，我们更有机会出百岁老人。

**勒：**也许也是因为人们生活得更好了……也许是摄入了更少的脂肪……

**董强：**但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还是要比法国低：大概低 10 岁左右。在中国人们的预期寿命要比在法国少 10 岁，但是在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在长寿者的绝对数值上更多一些。事实上，比较长寿的人一般都是生活在乡村的人

**树才：**在乡村里，在山区，的确有许多人很长寿，因为道教就是以长寿为目的的。道教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永生的梦想而存在的。

**勒：**我听说自五十年代以来，女性的身材都变小的。我们一般想，应该是变高大了，但事实是……我们可以算一算，因为中国人口的缘故，在中国这种可能性要比其它国家更大。通过测量孩子们童年和青少年的身高，以及生长发育期的女孩们的身高，我们就可以发现她们长得没有以前快了；现在，她们没有五十年代的女孩们高了，但同时，人们普遍觉得，她们应该长得更高了，这似乎不是真的。我们总是说，这是与饮食相联系的，但比如我吧，我就是在物资极度缺乏的一个时代下长高的。

今天的讨论真的很热烈，十分感谢您组织了今天的这次交流活动，我从中得知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有趣细节。

**吴岳添：**您所谈的一切对于我们了解法国现今的情况和法国文学都很有帮助。我们十分感谢您，我们希望可以出版您更多的书籍，也希望能再次在中国见到您。

**勒：**谢谢，我十分乐意。能用中文出版我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荣幸，这十分重要，不仅因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是如此的不同，也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共同点，而且在我看来这些相遇是十分有趣的。谢谢。

**董强：**那我们今天就座谈到这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勒克莱齐奥先生！